

中华诗词唱响新时代

—在全国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郑欣淼

这次诗歌座谈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远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总体战略格局,为新时代诗歌尤其是中华诗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各位诗人、专家的热烈研讨和真诚交流,本次座谈会一定能为新时代诗坛奉献一批丰硕的诗学成果,留下一道灿烂彩虹般的精神光芒。

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我近来一直在认真思索一个严肃而又重要的题目:中华诗词能否为新时代歌唱?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吟魄千年自骛驰

回顾中华诗词的历程,需要明白的是,“唐诗、宋词、元曲”,只是说诗、词、曲这三种诗体,在这三个时代分别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是这三个时代最为辉煌的文学成果,但不等于说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了。例如唐诗与宋诗,唐代有诗歌传世的作者仅3300多人,而宋诗作者多达9200人;唐诗流传下来有5万多首,而宋诗则有20余万首。而且论特色和影响,宋诗也可以和唐诗相媲美。钱锺书先生就说:“唐诗多以丰神韵擅,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宋代诗坛跟唐代诗坛一样也是群星璀璨,光芒万丈。正所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清蒋士铨《辨诗》)。唐音和宋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审美范式,后人作诗,或尊唐或宗宋,概莫能外。

就这几种诗体而论,实际上都是贯穿了以后的各个时代,繁衍不绝的。而其中诗又是主流。这就形成了诸多诗体同时存在的现象。即新的诗体产生了,以往的诗体却并没有消失,不仅仍然存留下来,而且继续得到发展,不断丰富诗歌的形式。这就出现了中国诗歌体式独特的运行方式,即各种诗体同时存在于某一时代。这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方式。现当代写旧体诗的人,一般是诗和词都写。例如毛泽东同志既写诗又填词,既写律诗、绝句,还有古风。现代还有如吴梅等大家,诗词曲俱擅。大体而言,前代的诗体渐趋古雅,近期的诗体趋于新俗,往往在文学思想的表达与社会功能的承担方面各有侧重。

从清末、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剧变时期。从五四以来,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旧体诗词虽然遭受厄运,但不同于任何一种古典文学样式的是,她仍然在坚守中有所发展,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在承担现代使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抗战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也仍然有郭沫若、老舍、郁达夫等许多诗人在坚持旧体诗的写作。

旧体诗词即传统诗词的创作,新时期以来得到复苏,现正在复兴中不断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创作实践,更进一步证明这一文学体裁也可随历史前进获得新的生机,它不是凝固的、僵化的,仍

然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而且能够表达新的社会内容,适应新的读者需要。但是,我们说传统诗词可以适应新的生活,并不是说它不需要变革了。我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程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逐渐变化,诗歌创作本身也发生着变化。例如,“诗界革命”就曾对旧体诗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过革新,包括描写新事物,“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语)。虽然基本上仍然是古代诗歌的体制,但是诗歌的观念已经在更新。当前出现的旧体诗写作热潮,正是前人这种革新探索的一个艺术继续。

不凋松柏喜抽枝

1987年5月31日,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中华诗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已经走出低谷,经历复苏,走向振兴,初现繁荣。我们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普及与提高并行,诗词工作在稳步前进,诗词创作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创作水平在逐步提高,诗教工作成效显著,诗词活动异彩纷呈,也陆续产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优秀作品。1994年《中华诗词》杂志创刊,当代诗词事业又掀开崭新一页。这份杂志目前每期发行量近三万份,主要订数既没有官方摊派,也不仰仗广告促销,都是读者自发去邮局订阅的。从这一侧面,也可以反映诗坛民意,同时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展示了这一传统诗体在新时代的群众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网络诗词更为活跃,用手机、微博创作诗词、交流思想、抒发感情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年轻人的加入,为旧体诗词创作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诗词的热度正在持久上升。

中华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情、中国梦的重要载体,凝聚着民族精神,体现着时代风貌。美国学者马斯洛说过,无论人类的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作为宇宙间的万物之灵,它总有一种共通的、永恒的情感,成为人类终极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悲悯、善良、奉献,以及对信念的坚守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中国梦与全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中国梦对世界来说,就是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一位诗人的心里,都有温情敦厚的琴弦,不管他采用新诗的形式,还是采用中华诗词的形式,都会深情地弹奏兴观群怨的乐曲,以优美的作品歌唱人间的真善美,以增进自身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中华诗词汇入新时代的浩荡洪流,接受新的审美质素,开拓出新的境界,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活力。尽管新诗和诗词两种诗体互相争论和辩诘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两种诗体并行不悖、共存共荣、比翼齐飞的现实发展,也给我

们的诗坛营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诗歌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民族心灵史。可以说崇尚新变的诗歌(无论诗词还是新诗)每次都是勇敢地冲在时代思潮的前面引领风骚。无论怎样风雨如磐,怎样曲折坎坷,总是在时代脉动的第一时间传递心灵的火焰和思想的光辉。

我很不赞成这样一种说法:传统诗词今天之所以还有一席之地,是拜新诗缺陷之赐。似乎只要新诗大力发展,就可独霸诗坛,传统诗词则会销声匿迹,无立足之地了。这种认识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不懂得中国诗歌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前面已说过,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的多种体式以及词、曲等形式是逐渐丰富,且共同存在的。因此新诗产生了,并不意味着传统诗体就要消亡,而是中国诗歌园地里多了一种新花,诗坛多了一个表现形式,中国诗歌体式则更丰富了。我们现在常说鲁迅、郭沫若等一批大家,开始以新诗出名,后来又主要写旧体诗,似乎很奇怪,其实从中国诗歌发展的特点看,这是十分正常的,新体诗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新体诗、旧体诗,都是他们可以使用的形式,我们也期望今后这样的诗人越多越好。

秋菊春兰俱得时

中华诗词与新诗同是诗歌园地的两枝奇葩,虽诗体各异,诗性却相同。其用以表达主题的意象意境多是相通的。搞诗词创作的人不妨多读一点新诗,学习新诗的创新和敏锐思想、灵动的语感和鲜活的句式,以及吸取民歌和外国诗歌的艺术影响。开阔眼界,吸取这些作为营养,使我们的诗词作品更有新意。

我一直认为,新诗与旧体诗词在诗歌的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今天许多写旧体诗的人,也曾经写过新诗,我就是一个,因此对新旧诗关系的体会比较深。中国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不幸几年前去世了。他的成名作是纪念张志新的长诗《小草在唱歌》。我们相交于“文革”之初,后有往来,他写新诗,我写旧体诗,常互赠作品。2011年11月,我俩一同出席厦门第三届中国诗歌节。见到他很高兴,我填了首《贺新郎》相赠:“往事那堪说?正神州、红羊历劫,万般萧瑟。君露峥嵘《新霞大》,我在骊山一豁。便尔汝,因缘天设。渭水长安初阅世,祖龙陵、更见秦时月。鹭鸶会,念尤切。玉台一雁高倾颤。振金声,放歌小草,杜鹃啼血。我亦鸿泥留吟絮,平仄藩篱偶涉。漫嗟叹,诗肠自热。好句非关新与旧,但真情、今古相连结。且共勉,莫停歌。”“好句非关新与旧,但真情、今古相连结”这是我的真切感受。他也和了一首。两首都收在《郑欣淼诗稿》中。

也就在这次厦门中国诗歌节的发言中,我说,著名诗人舒婷在《双桅船》里写道:“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诗人感受到追

求理想过程中的艰难与沉重,又同时感受到了时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两句新诗可以“翻译”成两句五言诗:“雾湿双桅翼,风催一叶舟。”也可以“翻译”成两句七言诗:“雾虽湿翼双桅重,风正催舟一叶轻。”可见新诗和旧体诗在意境上是相通的。

2013年,我参加北京恭王府的海棠雅集,写过一首绝句:“岂负骚肠八斗才,海棠树下且徘徊。花时岁岁吟难尽,国艳合为诗客开。”生活的花朵鲜艳芬芳,为新诗人而开放,也为旧体诗人而开放。花时岁岁吟难尽,岂分新诗和旧诗?旧体新诗开并蒂,泾渭无须太分明。我也试着把这首绝句“翻译”成一首新诗:

是花在催诗?

—良辰美景,八斗诗才。

是诗在催我?

—海棠花下,几度徘徊。

吟也吟不尽啊

—岁岁青春,无边花海。

倾城还倾国啊,

—人为花醉,花为诗开。

这种“翻译”当然仅仅是一种尝试,选择旧诗还是新诗,取决于诗人抒情方式的自然选择。

可以说,新诗与诗词同气连枝,共同构建出中国诗坛的绚丽风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两种诗体之间缺少互相沟通和理解,都过于各自为重,自以为是,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忽视了应该互相学习的问题。就诗词界而言,摆正诗词和各种文体尤其是和新诗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的现实问题。好的诗歌闪耀着一个时代的思想火花,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分量、审美经验和生活智慧,是时代诗坛共同的文化珍宝。新诗和诗词互相学习,互相沟通,加强交流和对话,相信我们的诗坛将呈现出一种更加和谐美好的发展愿景。

而今更待生花笔

我们提倡诗人关注民族命运、关注社会人生、着力反映时代风云。这也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诗人应该有明确的是非、强烈的爱憎,既有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也有对丑恶现象的鞭笞,还有对不合理状况的批评。

要写好诗,诗人就要有一定的才、学、识,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见微知著,一芽知春,一叶知秋。诗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但诗人离不开政治,也不能没有理性的认识,应有一定的理论修养,知大局,明是非。在当前,更应有忧患意识,关心国家发展、社会安定。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以更多的启迪。

诗词创作总是关乎时代风云,诗人应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了解社会现实。诗词是人创作的。诗人是社会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诗人的作品中,总能看到时代的影子,所

不同的是自觉地反映还是不自觉地反映,是反映得多还是反映得少。历史上的诗人有的是关注政治、直面现实,其作品被誉为“史诗”;有的着重抒写个人的遭遇,但倘或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而言,其实也能从中看到时代风云、社会浪花;当然还有一些诗人的感触喟叹似乎确实是所谓个人化写作,但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两句诗出自李商隐的《乐游原》,表面上看是诗人的自我感叹,但是人们从中所看到的却是晚唐帝国的衰落与诗人自我信念失落交织的一幅景象,因此也就无形中含蕴了丰富的社会意义。

当前,旧体诗词作者很多,作品数量也很大,可惜精品力作不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出精品,攀高峰,这仍然是诗词界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核心目标。

诗人要认真学习传统,这种学习不是泥古仿古,食古不化,一味追求古诗的原装原味。而是要善于“老瓶装新酒”,运用前人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创造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新内容。要善于创造新意象,讴歌新事物,书写老百姓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诗词的社会功能。这些都需要下大功夫,不断地探索,逐步地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关心诗词事业、研究诗词发展、为诗词振兴鼓与呼的同道者已经越来越多。不仅诗词的发展引人注目,楹联、辞赋等传统文体,也同样得到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个文化现象。

繁荣诗词创作,要坚持“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要形成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宽松环境与氛围,鼓励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争鸣与竞争。只要是统一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这个大前提下,不同的诗词理念、诗词体裁、诗词风格都允许讨论、切磋与探索。目前,我们的诗词流派与风格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通过不断创新与改革,通过不断探索与争鸣,形成既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有“典雅派”,也要有“土豆山药派”;既鼓励诗人们的个性创作,也要引导诗人把自己的个性与人民性、民族性、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诗词在新时代的认知、教育、讽喻、娱乐等作用,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造成一个既宽松活泼又昂扬向上的繁荣局面。

让中华诗词唱响新时代,诗人们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歌者,新的歌者来自新的时代。圣火传承,光明普照。我诚恳祝愿并期待中华诗词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在我们新时代诗人的手中继续发扬光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注入深情,鼓呼歌唱!

诗人主体性的正面建构

□陈仲义

主体形塑与分级“价位”

谈论诗歌和诗歌文本,无法回避它的生发者、主宰者——诗人主体性。站在文明“制高点”上,人们希望诗人的主体性除了表现对历史、文化的批判外,还表现在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整体生命的悲悯关怀而有所“救赎”。由于文体特点,主体性通常变身为神圣的“代言人”身份,不断追问与质询有关生命价值、意义、自由、美等人类高级精神活动;诗人往往被拔高为“以自己潜心的不懈的写作重构一个精神王国,一个超乎现实之上的伟大幻象——人类精神的乌托邦”。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创世者,一个受难者,一个创造历史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战士”。

现代诗人不仅能感受存在的遮蔽,更要勇敢地担待荒诞、绝望、虚无,以良知和爱心关注人类濒临精神的困境。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不能成为人类的神明,起码也能成为自己精神的上帝,首先是对自己灵魂的关注和照耀,而要坚固这一诗的立足点,其关键是决不放弃对价值与意义的追寻。而诗人的高下“等级”也自然形成排行,尤其是大诗人的偶像标签,一直以来被热议着。

从大诗人的要求、条件出发,人们自然饶有兴趣展开“分级”排行,笔者试将本行当的从业者分为五级,并给予自定义。

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为一代、几代集大成者。

重要诗人: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流派的领衔者、或某类诗歌的开拓者。

杰出或优秀诗人:极具风格或某一范式的突出者。

一般诗人:脱离模仿的自立者。

诗习者:处于描红阶段者。

2017年,丁先来出版了《诗人的价值之

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诗人的精神、使命。以高蹈的精神气象,全方位给出正面形塑:诗人是为了表达人类幽深的心灵而存在之人。是为了在没有梦幻的时代依然顽强地创作精神梦幻之人。诗人在人类经验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为了凸显自身的价值,他就必须坚定地走能通向人类幽深心灵那条道路,并成为人类深层精神梦幻的展露者。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代语境——诗人褪下光环,带有更多凡夫俗子的成分,面对这一新变化,该如何以“高尚普通”的身份认同来发声呢?

将诗人从神坛、祭台请下,也从闹哄哄的集贸市场回归,笔者更愿意就“当行”的基本职能,给出“从业者”的几条“达标”线:

一、自我对话。现代诗人本质上是在心灵深处从事自我诘辩、自我说服、自我清洁的作业。早期那种直接、独白的宣谕已然转变为偏重复调的互动“交流”,即在灵魂的层面上,进行自我磨砺。

二、类群代言。现代诗人从神与上帝的“代言”退回到存在领域,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甘于日常琐屑,而是以“个我”身份言说少见的、或不见的“诗性真理”,以及重新擦拭“普遍真理”,乃属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精神骑士。现代诗人无法彻底摒弃乌托邦气质,即便和各种“假想敌”——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物质化的、工具理性的风车作战,最根本的,也要保持一以贯之的“独往”气质。

四、思维冒险。现代诗人所从事的是感觉、想象、灵性、智性的思维冒险作业,这是他区别于其他行当的基本点。在思维的莽原上,他是到处奔突耀眼的闪电。如果勉为其难,或欠缺才情,还是趁早改行更好。

五、语言炼金。“炼金术”是18世纪西洋诗歌最锃亮的勋章,至今没有过时生锈。现代诗人作为语言“炉前工”,一直在火烧火燎的前线承

担锻造语词的重任。所有语料外化为出色的诗语,乃是对诗人能力的最高奖赏与检验。

主体人格的正面建构

社会学的人格相对讲究统一完善,可供观摩;诗学上的主体人格因其特异而多纠结分离。但不管怎样,构建诗歌文本,永远离不开诗人的人格“底座”。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气神高低,经常主宰文本质量的好坏。诗人体格,意味着要在文本中实施个我形象的最高塑造。而“自我形象”其实是作为文本的“镜像”副本,由内在“自我”与外在“他者”共同打磨,最后形成读者接受的效应。自我形象强大时,“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过强烈的主体性抓住读者,并以此制胜;但自我形象有时弱一些,或有时隐匿一些,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质素中,默默地释放能量,也够得上带出一个“影子部队”——如果做得好的话,隐性的自我形象依然不乏光彩。

普遍地说,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诗歌主体俨然成为诗国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感、力量感、道德感作为表征,往往显现出我与存在的夸张性搏斗,且成为公众文化符号,成就了千千万万人向往的——人类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爱、温情、良知以及尊严、自由、独立的张扬,都是关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见,人心的荒漠多么需要至爱的滋润,愚顽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牵引,阴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萎顿的人格急待圣水洗礼。任何过于偏移个我阴暗面的渲染,其实都是有悖于人类——这位奇特设计师的善意。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面,那些过于夸大渲染人的残缺、黑暗、破损部分,还是应该有所收敛,以免过分偏激偏斜;另一方面,现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是人与世界的离异和人与人的离异,在充满娱乐至死和自我放纵的下坠中的挣扎,不应逃避针砭与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诗人的自我形象应锁定在较高起点上,“为民族鼓瑟者;为人民鸣角者;为万物抒琴者;为心灵击节者”。

强力意志通常被视为“自我膨胀”,其实并非坏事,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博大与扩张,并称于极度自由形式。而与之相反的主体的自我节制,也并非下贱物。内敛式的“退缩”,应看作主体毋宁以不动声色的面目隐匿、内化于文本织体,在万千经纬纵横的缝隙间悄悄绽放自我。这或许更符合当下生存境况。总之,不管以何种逞强或偏弱的方式经营主体,在自身与他者作用下此消彼长,都得坚韧地贯穿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或幽幽地发亮,或熊熊地燃烧,或半明半暗地保存温热。这些都是诗歌鲜明的主体性区别于其他文类主体的重要特征,也是诗歌更容易打动人心的隐秘所在。

新世纪以来,处于边缘的东南一角——以宜宾为首的“完整性写作”,高蹈着诗人的精神与梦想,在自然百孔千疮、诸神遁走无踪的时代,重提诗人法则——重返人性大地,把普遍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植入个体心灵,以此抵抗欲望对人的侵蚀。

没有机会给诗人的特殊气质做测试,但相信

只用普遍通用的神经反应测试模式,诸如感受性、耐受性、敏捷性、兴奋性、可塑性、情绪性、稳定性等几个参数,多数诗人的指标不同于常人,这是职业特点。如同优秀运动员的禀赋——反应频率、肌肉记忆、瞬间爆发力,一定明显优于常人。所以说诗人是很难培育的,也才有“天才诗人”“天生就是诗人”之说。而真正的秘密是诗与诗人的关系。在这点上,诗入长期陷入误区,以为自己是诗歌的天王,完全可以驾驭一切。殊不知,经常是他在写诗,实质上是诗在写他。极端地说,是诗驾驭了他,主宰了他,诗反过来写他。这就意味着,诗一旦进入生成状态,所谓主体性蒸腾了,主客体泯灭了,才是写诗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在诗人与文本两者关系上,多数时候水乳交融,少数时候相悖分离。有人在比较之后得出“高下”:

诗比诗人更强大。诗比诗人更永恒。